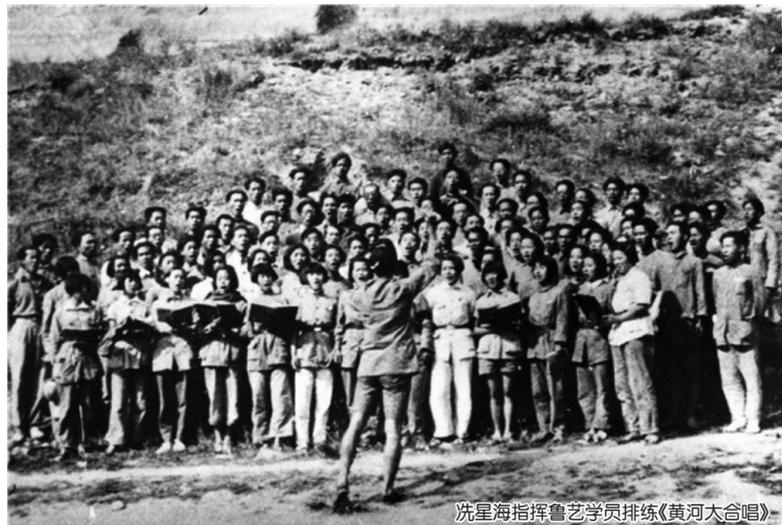


关注



冼星海指挥鲁艺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

抗战音乐是个大概念、大课题,也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凝集着深邃复杂的民族情结,也承载着宏阔丰富的历史内涵。关于抗战音乐,要说的话太多,但这里只谈两点:第一,抗战音乐的主体是中共抗日武装及其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而非前时期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音乐。抗战音乐起于抗日救亡运动,在武汉弃守后的国统区及正面战场不断式微,在中共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游击战场得以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共抗日武装及其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乃抗战音乐的主体。第二,抗战音乐主要是在中共组织领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主流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而非那种表达民族精神、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形成的抗战音乐,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体性、连贯性。这应是关于抗战音乐两个基本的历史认知,也应是抗战音乐研究的逻辑起点。

抗战音乐孕育于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后,东北沦陷,抗日救亡呼声响彻关内外。1931年11月,黄自就作有《抗敌歌》。淞沪抗战爆发后,黄自又和诗人韦翰章共同创作了《旗正飘飘》。在黄自的影响下,学院派抗战歌曲脱颖而出。此乃抗日救亡运动先声,也可谓最早的抗战音乐。至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中共在国统区的文化战线及其左翼文化组织基本形成。左翼音乐运动迅速与抗日救亡运动合流,于是就有以《救亡进行曲》《新编“九一八”小调》《义勇军进行曲》等有别于学院派的左翼抗战歌曲,左翼音乐家亦成为救亡运动的中坚。在左翼文化界策动下,群众性救亡运动在上海等大城市迅猛掀起,并以悼念聂耳为起点,以一二·九运动为高点,持续到1935年底。至此,抗日救亡运动达到第一个高潮,左翼也已成为救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此时中共大本营已战略转移到陕北,并在瓦窑堡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且此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已发表了主张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的《八一宣言》。为了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相适应,上海左翼文化组织于1936年春“自行解散”。虽然左翼的组织机构不再存在,但其人员仍在中共组织领导下积极策动救亡运动。故从1936年初至七七事变前,上海等大城市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群众性救亡运动,出版了一批抗战歌集,参加救亡运动的音乐家和青年学生也越来越多。这其中就有从法国学成回国的冼星海,尽管他那时还



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手稿)

不是中共党员,但与左翼很快接过了聂耳的火炬,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旗手,其《救国军歌》并显露出鲜明的群众化取向。由此可见,由于左翼音乐工作者参与,由于左翼大众化理论的渗透,抗日救亡运动已成为一场群众性救亡运动。正是依托抗日救亡运动,抗战音乐得以产生、发展,并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中既充满爱国主义情怀又具有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的音乐景观。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启。1937年7月28日,上海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期。一首题赠第29军大刀队、堪称杀伐之声的《大刀进行曲》奔涌而出,开启了抗战歌曲的新风。淞沪会战打响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13支抗日救亡演剧队于8月20日从上海徐家汇等地出发,到全国巡演,宣传抗日救亡。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全国抗战文化组织也陆续集聚武汉。1938年1月,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救亡协会。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也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为主任,负责抗战宣传。其中六处一科为戏剧音乐科,主管歌咏活动,其成员就有冼星海、张曙、沙梅、林路、任光、赵启海、李才。1938年田汉、贺绿汀等上海文化界名人也来到武汉。他们都是在武汉组织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第三厅隶属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接受中共长江中央局的领导。这也是救亡运动在武汉三镇蓬勃开展的原因。随着各正面战场的失利,奔赴各战区的演剧队、服



鲁艺音乐工作团在街头对群众演唱抗战歌曲

务歌咏运动的组织者张曙、林路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转移到桂林。大批进步音乐家也转移到西南大后方,并创作了一些成功的抗战歌曲,如《嘉陵江上》,后来一些音乐家如陆华柏、吴伯超、章枚、马思聪、吴式昕、满谦子、李志曙等也先后转移到桂林。这些音乐家在张曙、林路的组织领导下开展抗战宣传,创作歌曲、办班办报、出版歌集、举办活动,使抗战歌声在桂林这个抗战文化中心得以延续。但令人扼腕的是,1938年12月24日张曙不幸遭敌机轰炸,殉难于战火。另一些音乐家则前往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或到西南后再前往抗日民主根据地。冼星海于1938年11月3日抵达延安,终于亲眼看到了他在《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中所向往和憧憬的那番景象。此外,吕骥、李劫夫、郑律成、向隅、麦新等作曲家先后也到

# 抗战音乐的主体和主流

□李诗原

团也都退至武汉。至是年8月,从上海奔赴全国巡演的13支演剧队有5支已集聚武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集聚武汉的抗日救亡宣传组织编成10个抗敌演剧队,前往武汉外围正面战场助阵、慰问。从三厅成立到武汉弃守,武汉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红五月宣传周”“抗战献金音乐会”以及“七七抗战周年纪念”“八一三宣传游园会”“九一八纪念音乐会”等多场大型歌咏活动。总之,1938年夏秋,武汉三镇,已成为全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中心,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也在此时此地达到最高潮。但随着武汉保卫战的吃紧直至是年10月25日武汉这个“东方马德里”的不保,这个中心很快就消逝了,在国统区掀起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从此衰落。武汉弃守后的1938年11月,武汉抗日救

亡了延安,何士德、孟波、任光、章枚、贺绿汀等则去了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显然,无论是转移西南还是奔赴延安,都使国统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力量大为削弱。隶属第三厅的10个抗敌演剧队也随军分配到正面战场的各战斗序列,故降低了在民众中宣传抗战的可能。总之,从九一八到武汉弃守,抗战音乐依托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得以形成和发展,但武汉弃守后国统区和正面战场的抗战音乐不断式微。

与之相对应的是,抗战音乐在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了充分发展。全国抗战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集聚了大批专业音乐家,他们大多来自国统区,并在七七事变前参加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故很快便推出了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如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



甘正伦木刻《怒吼吧,黄河!》

而此时的上海,中共领导的左翼也正积极介入国统区的抗日救亡宣传。至20世纪30年代中,抗日救亡已成为左翼音乐家最主要的宣传工作,中共已成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七七事变后,中共依托国共合作,继续组织领导着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演剧队和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敌演剧队,还在抗敌演剧队中秘密成立党组织。武汉救亡歌咏的组织者如田汉、张曙也大多是中共及其外围力量,而对抗敌演剧队和武汉救亡歌咏实施操控的则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周恩来和郭沫若。这些都说明,武汉弃守前抗战音乐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也是分不开的。武汉弃守后抗战音乐在西南大后方的发展,也没有离开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和领导。还值得一提的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6年中,中国工农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音乐,也不只是宣传土地革命的,还有旨在宣传抗日救亡的,如中央根据地的《反对日本进攻中国》《抗日反帝歌》、湘赣的《反对帝国主义》、湘鄂川黔的《打败东洋就回乡》、湘鄂赣的《打败东洋就回乡》、川陕的《团结起来救中华》。尤其在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召开瓦窑堡会议之后,抗日救亡更是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音乐的思想主题,陕甘宁的《亡国奴不能当》《合力打日本》《保卫华北小调》等歌曲就反映这一思想主题;甚至浴血河西走廊的西路军也撰写了宣传民众抗日的《唤醒西北同胞歌》等救亡歌曲。这些早期的宣传抗日救亡的歌曲作为抗战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是在中共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毫无疑问,武汉弃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抗战音乐则更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即便在这一时期正面战场抗敌宣传队的歌咏活动中,也不难发现共产党人的组织和把控。

至于说抗战音乐的主流,无疑也是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中共抗日武装及其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而非那种作为爱国主义文化的国统区和正面战场的抗战音乐。很显然,这不仅仅是就体量而言的,也无论是七七事变前还是七七事变后,而更重要的是就其文化价值而言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主流。何谓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其诠释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中共抗日武装及其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以及左翼的救亡歌曲,作为一种抗战音乐主体,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这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抗战音乐,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浴血抗战中还旨在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意识,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一致,并力图用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形式将这种科学精神传达给广大民众,进而达到真正武装民众、鼓舞抗战的目的。因此,相对国统区那些仅仅在于表达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在形式上还不乏唯美取向的抗日救亡歌曲,更显露出一种有利于广大民众自身发展、更有利于改善其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这就意味着,中共抗日武装及其抗日民主根据地产生的抗战音乐,与那种仅仅以爱国主义为支撑的抗战音乐相比,更具有文化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种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的抗战音乐更具时代精神,更具进步意义,故成为文化上的主流。

评点

## 《乐龄唱响》:用荧屏佳作诠释“夕阳金色价值”

□何天平

时下,各类综艺节目层出不穷,丰富多彩,但看似风光正好的综艺市场却一直存在着一种隐忧。随着“得年轻人得天下”被奉为行业圭臬,以老年群体为主要受众对象、展现老年群体美好生活的综艺节目却始终处于缺位状态。老年人逐渐被荧屏遗忘,他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也逐渐走入了大众视野的边缘地带。庆幸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推出全国首档面向2.5亿老年群体的音乐暖综艺《乐龄唱响·全国老年合唱大赛》,该节目以访谈加合唱大赛的全新形式,带领观众领略前辈们的青春岁月、历史征程,感受他们源自音乐的欢唱,以及在动人旋律中的精神传承。第九期节目播出后,节目相关文章在互网阅读量已达千万余次,节目原创短视频在抖音平台播放量已超1300万次。作为国内唯一将镜头对准庞大老年群体的竞赛类节目,《乐龄唱响》以生动的节目内容诠释出“夕阳金色价值”,彰显出新时代老年人向上、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虽然《乐龄唱响》是为老年群体打造的专属艺术舞台,但其对于合唱的呈现始终把持着高标准、严要求。节目采用场内综合评分方式,力求做到公平、公正。100位青年观众和100位乐龄观众共同组成大众评委团,聆听合唱团背后的动人故事,见证老人们于舞台之上呈现的真实表现;而舞台之外的第



二现场中,每期节目邀请10位专业音乐人组成了专家评委团,他们对于合唱团的身份一无所知,甚至只能通过节目组提供的耳机听到现场歌声,合唱水平的高低成为他们打分的唯一标准。正是因为对实力有着相当的专业追求,《乐龄唱响》的舞台之上诞生了不少让观众叹为观止的精彩表演。像唐山乐友合唱团用纯人声完成世界名曲《拉德斯基进行曲》,北京童心合唱团带来的英文歌曲《You raise me up》,哈尔滨群星合唱团的《我的

深情为你守候》,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乐龄唱响》用媲美专业团队的演唱技巧征服了观众,更用老年人在音乐中迸发出的快乐触动了人心。在呈现精彩绝伦的合唱赛事之外,《乐龄唱响》还专注于呈现老年人开拓、耕耘、建设、创新的中国故事,以及对当下老年人生活的深度聚焦。节目组从全国各地老年合唱团中筛选出的32支合唱团,来自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共和国开拓者、建设者组成,

从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火箭、第一炉铁水到第一位自主培养的博士……节目通过一个个青春岁月、艰苦创业的开拓故事,展现了老一代人作为国家先驱者、建设者的责任担当,他们的故事和歌声使每一段耳熟能详的旋律焕发别样的神采,传递出博大深沉的家国情怀。当然,作为一档“老”节目,如何引发“新”观众的共鸣,在竞争激烈的综艺市场赢得一席之地,同样是件颇具挑战性的事情。《乐龄唱响》提供的经验也值得借鉴,比如,无论是制作还是宣传推广,都力求融入时下潮流,使各年龄层的观众都能参与、融入进来。尤其是节目打造的专属小程序,为观众提供了高效丰富的互动体验。此外,节目还积极通过新媒体传播矩阵,以原创短视频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些新颖的互动传播方式,让不少年轻人加入其中,乐于聆听乐龄老人发自肺腑的欢唱。

融入生活态度,呈现乐龄价值,让老年人的声音被大众听见、听懂,并感悟他们所展示的那份热爱,这正是《乐龄唱响》以合唱为载体进行文艺创作和表达的特别之处。《乐龄唱响》的出现和“出圈”也启示了国内综艺市场对老年群体精神文化世界的关注,以更多为老人而作、为老人而歌的荧屏佳作,向大众生动诠释他们的“夕阳金色价值”,共同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文明风尚。

中秋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之一,寄托着团圆祥和的美好愿望。今年中秋又恰逢国庆,蕴含着赤诚仁爱的家国情怀。在中秋到来前夕,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指导的“网络中国节”品牌活动首次进入音乐领域,光明网联合酷狗音乐、中国原创音乐基地5sing共同发起“秋月有声”网络中国节·中秋歌曲征集推广活动,面向全球音乐人征集中秋音乐作品,邀请活跃在互联网上的年轻一代唱响家国情怀,在线上共度佳节。

此次活动旨在召集广大音乐人及传统文化爱好者结合节日习俗、传统诗词等文化元素,以“思人、思家、思天下”为主基调,共同谱写对美好生活的赞美,为原创音乐人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让数字音乐传播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活动于8月20日在酷狗音乐、5sing双赛道上线,分为征集、评选、公开投票、结果公示等阶段。网友们不仅可以参加歌曲的原创比赛、翻唱比赛,还可以参与活动投票,共同营造网络中秋氛围。活动最终将综合网友票选、播放量及媒体专家点评,择优推出一首2020“网络中国节”活动推广曲,以及一首最具人气歌曲。推广曲获奖者将有机会参加“网络中国节”线下展演活动。

主办方表示,数字音乐与传统文化元素的结合,不仅可以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为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提供突破口,也可以给予人们全新的视听盛宴和文化滋养。用数字音乐诠释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是一次颇具文化内涵的创新尝试。希望此次活动能进一步加深网络受众对传统文化的体验感、参与感,集大众之力唤醒文化根脉的传承,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使传统节日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秋闻)

### 创新传承节日文化 网上唱响秋月之声